

文坛艺林 沧桑录

我所记载的文坛、艺坛诸位人物，包括胡適在内，都是曾经与我过往较密的，所以文章所记载的基本上都有确凿的依据，而绝少转引不可靠的第二、三手材料。至于这些人物和我个人之间的往还，则并未一一写进文章，例如瞿白音夫妇对我写作上有很多帮助，对其他方面亦关怀备至，现在这篇《瞿白音及〈创新独白〉事件》仅仅写了他一生最主要的经历，其他均未涉及，将来还是要写的。

蒋星煜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文坛艺林

沧桑录

蒋星煜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艺林沧桑录/蒋星煜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5

ISBN 7-5326-0883-2

I. 文... II. 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4786 号

文坛艺林沧桑录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875 插页 3 字数 213 600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100

ISBN 7-5326-0883-2/J·56

定价: 25.00 元



2001 年蒋星煜在友人处留影



赵景深八十大寿时程十髮等向他祝贺（1982年摄于上海衡山宾馆）



谷斯范、蒋星煜、萧军、刘恩铭、萧军
女儿 1986 年摄于湖北武汉黄冈东坡赤壁



吴新雷、宁希元、王季思、蒋星煜、龚和
德（前排）1986 年摄于山西临汾山西师范大学



蒋星煜、波多野太郎、梁沛锦、索罗金、雪洛娃 1987 年摄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茹志娟、王维、蒋星煜 1990 年摄于上海松江



蒋星煜、陈芳英 1990 年摄于河北石家庄



施国英（左起第二人）等华裔作家与蒋星煜 1996 年摄于澳大利亚悉尼

目 录

孤岛文学的回忆片段·····	1
史伍、萧斧与《新文艺》月刊·····	9
站在文化斗争前沿的范泉·····	15
初创建时的鲁迅纪念馆·····	27
关于《李自成》的半次座谈会·····	32
文采风流秦瘦鸥·····	43
罗竹风与历史小说、历史戏剧·····	53
澳门女作家笔端的澳门女性	
——读汤梅笑的感受·····	65
澳洲华人作家印象·····	72
陈毅市长与上海戏曲·····	81
冯雪峰因“戏改”遭批评·····	90
现代艺术档案 珍贵历史文献	
——有关《戏曲报》的一些回忆·····	94
胡適与元杂剧、明清传奇·····	101
从北新书局到赵景深故居·····	123
赵景深与戏剧理论著作评奖·····	130
赵景深晚年与王季思的关系·····	136
《十五贯》改编演出的深远影响·····	142

渊源于《情恨狂澜》的甬剧《半把剪刀》·····	154
难忘的浦江饭店的 365 天	
——1961 年《辞海》修订工作的回忆·····	159
台湾戏曲史论女教授们及其著作·····	169
北昆名旦洪雪飞·····	181
梁谷音和她的《琵琶行》·····	189
计镇华的表演艺术·····	194
澳洲华人的越剧情结·····	202
舞台上最负盛名的繁漪——赵慧深·····	206
瞿白音与《创新独白》事件·····	218
宜兴储家三枝笔	
——储安平·储玉坤·储大泓·····	232
魏克明诗斥“四人帮”·····	244
我与《光明日报》·····	254
波多野太郎的古文与印章·····	265
田中谦二的师承与对晚辈的培养·····	269
荷兰汉学家伊维德与中国戏曲·····	283
美荷两国学者合译弘治岳刻本《西厢记》·····	289
附录 共享丰收的喜悦	
——蒋星煜学术研究 60 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	300
后记·····	309

孤岛文学的回忆片段

孤岛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几乎是一个空白点。对此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方面的著作都有一个相似的框架结构。试以建国初期 1955 年作家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为例,作者叶丁易曾在国内各大学讲授这门课程,后来还到莫斯科大学去讲这门课,他的著作影响颇广。这本书的第十章为《抗战文学作品》。其中第一、二、三节谈的是国民党统治区,也就是所谓大后方,包括重庆桂林等大城市在内的文学创作活动。第四节为《陕甘宁边区和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学活动》。孤岛文学没有专章专节,一个小小的段落也没有,仅仅在第三节第五部分《杂文和报告文学》里面有这样三句话:“倒是上海沦陷后,留在那里的一些进步作家办了一刊物——《鲁迅风》,专登一些和敌伪作斗争的杂文。”

孤岛文学,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提法,再去改变这一历史上的客观存在的提法是不必要的,也是不科学的。因为孤岛一词当时普遍使用于整个社会生活、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并非只在文学范畴内使用而已。当然,这里所谓孤岛,政治上的涵义超过了地理上的涵义,决非《鲁滨逊漂流记》所描写的那种孤岛,而是在日本侵略军所侵占的大片土地上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但又和大后方以及陕甘宁边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的一定区域。所以有人说“孤岛不孤”，也有一定的道理。当时的所谓“孤岛”，并不包括现在的整个上海或整个上海市区，而是抗战之前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这一块土地。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英、美、法三国虽然和日本有着尖锐的矛盾，但并不是交战国，因此还能在租界行使行政、司法等权力，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只要不影响他们的利益，他们可以容忍，这是一个方面。而日本侵略者对租界当局则不断施加压力，尽可能要把抗日活动扼杀，租界当局有时也采取妥协的办法，对包括文学活动在内的一切抗日活动下令停刊、停演等等，这是另一个方面。再就是有些侨居上海的外国公民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或者因为有较丰厚的报酬，甘愿出面向工部局登记办报纸办刊物的。孤岛文学就是在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形势之下产生的。所以一方面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不断送到读者面前，一方面作家们也不断受到恐吓、逮捕或被暗杀；一方面进步的抗日报刊不断出版，一方面不断受到警告或查封。如果我们对租界的复杂而微妙的形势不加以研究和分析，对以上种种情况的发生便很难理解而陷于困惑之中。

在抗战之前和抗战初期，上海一直是抗战文艺的中心，上海沦陷前后，大批作家去了大后方和边区，原来的文学报刊也都无法出版了，曾经有很短的一个时期比较沉寂。留在上海的作家很快就利用租界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而用文学的武器继续斗争。再说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侵入，沦陷区的人民群众一时无法去大后方和边区的，纷纷涌入上海租界，人口增加得很快，这里面既有资本家和开明地主，也有作家和文学青年，所以孤岛时期，原来在上海的作家虽然走了很多，但也有所补充，那些文学青年，既是文学作品的读者，抗日救亡

运动的积极分子,更是作家队伍的接班人。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不仅上海原来的创作队伍相当庞大,而且演出队伍、翻译队伍、编辑队伍也在全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虽然有些人去了大后方、陕甘宁边区、香港或南洋,留下的力量仍旧是雄厚的,所以有可能进行了这许许多多抗日救亡活动,出版了不少在全国有深远影响的文学作品。

这些都是说明上海在客观上对孤岛文学的兴起所提供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如何去利用,利用到什么程度,则应归功于中共江苏省委文委的具体领导,孙冶方、梅益等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进行抗日斗争的过程中,把问题考虑得很全面,尽可能保护每一个党内或党外的作家,一切活动都做到有理有节,任何一个作家遭到厄运,则总是设法予以关怀或营救,或派人掩护而送到安全的地区。没有党的领导,孤岛文学的蓬勃发展是不可想像的。

当时在文学理论方面有过一次论争,参加的人还都是些较有代表性的人物。那是因1938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而引起的,李平心、许广平、卢豫冬等在“鲁迅思想座谈会”上就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及其深刻的思想内涵进行了探讨和分析,由李平心执笔写成《思想家的鲁迅》一文,主张继承鲁迅先生的优良传统。鹰隼在《每日译报》发表《超越鲁迅》,表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再用曲笔,而且认为讽刺的手法也适合当时的需要。论争一展开,就把所有的杂文作家陆续卷了进去。当然也不可能获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结论。最后由巴人等34位作家署名,发表《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呼吁大家在抗日斗争的共同目标下进一步团结起来,停止这场论争。应该承认论争还是有

一定收获的,至少对于鲁迅杂文的风格及其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大家都比以前认识得清楚了一些,理解得深刻了一些。此外关于旧形式的利用等问题也讨论过,规模就不像论争杂文风格这样大,参加的人也没有这样多。

孤岛的现实决定了孤岛文学在杂文、报告文学、戏剧文学三个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

杂文往往能起到匕首或投枪那样锋利而准确的作用,而且在形式上非常多样,篇幅上也无一定限制,相对地说,比较自由。而正如《文艺新潮》的《发刊词》所说:“在孤岛的人们,既不能算作前线,也无法归之后方。”在军事上确实不是前线,但就文化战线而论,却是百分之百的前线,租界里也有日伪的报刊和广播,至于黄色凶杀类的庸俗作品更不用说。还有,日伪的魔爪还公开地或隐蔽地伸进租界,不时犯下血腥罪行。对于这些,最好的还击形式就是立刻加以揭露,加以控诉,加以驳斥,杂文当然是比较理想的一种形式,如果写小说,即使是短篇,也无法一蹴而成。杂文当时的风行,原因在此。于是有了《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有了专发杂文的期刊《鲁迅风》,有了唐弢、柯灵等七人合著的杂文集《边鼓集》等等。于是才会有关于杂文风格那一场论争。

至于报告文学,那是因为身处孤岛的人们很想知道祖国各地的抗战情况,很想知道大后方和陕甘宁边区的风貌,尤其很想知道过去所知甚少,而多少带有一定传奇色彩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的领导和许多高级将领的事迹。《文汇报晚刊》的副刊《灯塔》刊载了舒湮《延安纪行》,《申报》发表了《江南游击区杂写(粟裕将军会见记)》等等。所出单行本有沙汀《随军散记》,写的是贺龙在华北前线指挥作战的实况。外

国作家和新闻记者到过边区的也有一些,他们都写了报导或专著,美国的爱特伽·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以生动的文笔相当详尽地报导了长征的经过以及八路军诸将领的战斗历程,而且还附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图片,在国外不胫而走,风行一时。上海有的是翻译力量,于是由林淡秋、梅益、傅东华等人合作而突击译出,由胡愈之发起组织了一个出版社——复社,将此书改名为《西行漫记》出版,立刻成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们爱不忍释的读物。后来这一类翻译作品还出了《续西行漫记》、《华北前线》等等。

此外,由于上海一直是话剧的一个中心,专业剧团和专业话剧工作者虽然到香港、大后方、边区去了一大批,留下来仍旧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再说,在工商业中,在大专院校以及中等学校中业余演剧的队伍也很多,有的还相当有规模,所以剧作家不愁有好本子而不能演出。当然,那些业余剧团也在渴望优秀的剧本。这种情况对于上海的剧作家的创作活动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更何况舞台演出直接和观众交流,在宣传抗日、鼓舞人心方面比一般文学作品有其特殊的有利条件。当时的青鸟剧社、上海剧艺社、银联剧团、华联剧团、复旦剧团等专业、业余话剧团演出了许多新的作品,以于伶写的《花溅泪》、《女子公寓》诸剧演出次数最多。此外还有一些富于爱国主义的历史剧新作《碧血花》、《葛嫩娘》、《李香君》等,作者有魏如晦、周贻白、冒舒湮等。当然所演出的剧目并不仅止这两类,还演过曹禺的旧作《雷雨》、《日出》以及一批外国剧本的改编本。

孤岛文学在鲁迅研究与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鲁迅杂文风格的探索仅仅是许多问题中的一个

而已。当时许广平同志在上海,这是最有利的条件,她自己写了一些学习鲁迅、回忆鲁迅的文章,鲁迅给木刻工作者的某些信件也由她提供而首次在《文艺新潮》公之于世。《文汇报晚刊》从创刊之日起就转载《鲁迅日记》。这许多理论性文章和第一手材料为后来的鲁迅研究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

当然重大的贡献是《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以如此速度编成《鲁迅全集》,使这位文学巨人的全部作品(包括译作)能够问世,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确实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后来虽然有所补遗,有所订正,这对著作等身的鲁迅来说是难免的。这部全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部全集,在体例上作过缜密的研究,相当科学。其附录索引都够得上详备二字。可以与世界上其他文学巨人的全集比美而无逊色,并为后来编辑文学家全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至于长篇小说,直接写抗日战争的当时还来不及完成,但其他题材的作品则有的是,巴金的《秋》、钱钟书的《围城》等力作都是在这时期完成并出版的,一直到现在,仍继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文学艺术上,有一种情况可以证明“孤岛不孤”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上海的文学工作者除了积极投入创作、翻译之外,更以相当关切的目光注视着全中国的文学界。优秀的作品如《华威先生》、《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差半车麦秸》等小说,有的及时在上海转载,有的汇编成专书出版,使身处孤岛的读者仍有机会看到读到。钱君匋他们成立的谊社,先出版了《第一年代》,接着又出版了《第一年代续编》,把以上所提到的那些作品全都收录进去了。而在大后方、边区和香港倒没有出版过性质相同的书籍。

文艺刊物和报纸的文艺副刊经常以大量篇幅刊载文学家的行踪。例如《文艺新潮》的一、二两期,分别刊发了“巴金、靳以、钱君匋、雨田、华林于七月底返沪,旋巴金、靳以又南行至广州,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夏衍在猛烈轰炸下的广州主编《救亡日报》”等消息;对于黄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就直截了当地说“他现在浙江海盐的游击队中”,则似乎太不保密了。《中美日报》的《集纳》经常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作家动态。梁实秋、凌叔华、林语堂、老舍诸人的工作与行踪都报导过。巴金在《文汇报》的《世纪风》发了《桂林的微雨》,周文在《文艺新潮》发了《在重庆遇轰炸记》,董每戡在《文艺新潮》发了《南岳纪行》,这样,当时在桂林、重庆、衡山的一群文学家的情况从这些文章中就了解到不少。

孤岛文学还有一项战斗任务,就是对“落水文人”(即投靠日伪的文人)的揭露和批判,因为周作人在五四以来一直影响很大,投靠日伪做了伪“华北教育总监”等高官,所以成了主要的批判对象。当然在对他批判的同时也带到了他左右的钱稻孙、徐祖正等人,但也只是对他们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作荒谬的辩护而进行批判,对于其他纯属文学史或文学理论上的问题则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去详加分析、一一纠正了。

当时的形势既十分复杂而又十分微妙,极个别的新闻工作者、文学家由党组织指派进入《新中国报》、《杂志》等报刊内部的也有,如恽逸群、关露、袁殊等就是。他们忍辱负重,做了大量工作,无论对中华民族的抗战,对孤岛文学,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真是可歌可泣。当时大家不了解,或是为了麻痹敌人,有些文章锋芒也碰到了他们,当然是无法避免的。今天历史已经公正地宣告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中国共产党的

党组织也都为他们的艰苦斗争而记录下他们的功绩。

以上两种情况和性质截然相反的卖国与爱国的不同行为,绝对不允许混淆。希望将来会有一部全面的系统的孤岛文学史论述并分析这些情况和问题。

以上就孤岛的特殊环境和孤岛文学各方面的情况作了极简单的勾勒,虽然极简单,已足以证明孤岛文学的声势不小,阵容颇为坚强,而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页,决不仅仅是发表了一些杂文,办过一个《鲁迅风》期刊而已。

最后要澄清一个观点,我听到极个别的史学家对租界不无赞美之词,认为过去的观点太偏激,只看到租界的为害,而没有看到租界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他们往往用孤岛或孤岛文学作为一张王牌。对此我是不赞成的。作为殖民主义国家的租界,只可能完全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之上。当中国第一次、第二次国内战争之际,当抗日战争的初期,租界从来没有站到过反封建反殖民的立场上来,他们不可能帮助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也不可能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他们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尽可能在各种势力之间保持一点平衡和权变则是事实。至于人民群众如何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做一点革命工作和抗日工作,那不是租界当局的本意。中国的反封建反殖民的斗争归根结底就是要收回一切租界。殖民主义国家也懂得这个道理。至于个别的西方人士参加革命斗争、抗日战争那是个人的行动。我是就孤岛时期以言,太平洋战争序幕揭开,情况又变了,也不在本文评述的范围之内了。